

绪 论

相对于 20 世纪末以降的“全球化”，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百年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也是一次被纳入“全球化”的历程。为了将两次“全球化”区别开来，这里引入“前全球化”和“后全球化”这样一个说法。前次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拓展，对于 20 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标志的“全球化”，只能算是一次“前全球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追求，用殖民战争第一次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闭塞的中国也被卷入这一世界变革潮流。其次，比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农业文明，以现代化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世界性，不仅生产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而且消费也是世界性的，资本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追求世界市场的渴求。这正如阿芒·马特拉认为的那样，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全球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国富论》中提到的“全球化”、“宇宙

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①。第三，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

从此，人类文明的制导系统发生了变革，现代传播开始参与历史进程的建构。

在无法回避的“前全球化”的冲击下，机遇和危机同时走向古老的中国。

1840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枪击炮轰，自清初开始封禁的锁国大门在紧闭了二百多年后终于被迫打开。家国一体的正统秩序，泱泱大国的威仪、自尊，锁国闭关的安宁与平静，这一切似乎合法的运行轨迹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崩裂、走样，整个民族赖以维系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从此，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便踏上了动荡、屈辱、戒备、迷惘的求索之路。

“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②。这描述的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

痛楚与困惑的选择是无奈的，但谁让我们不早一点觉醒、自强呢？“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早在1815年，时代的预言家龚自珍就对封建衰世的命运发出警示。在《尊隐》篇中，他对比描述了“京师”和“山中”的景象。那“荣华富贵的最后一代”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马特拉的词与物》，《世界主义与文化霸权 代译序》第9—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和“受苦受难的最后一代”^①，就是对封建末世命运的宣言。作为封建专制集团的一分子，他想唤醒昏昏然的当政者，奋发图强，以避免衰亡的命运；作为主流话语圈的边缘人，他抨击时政，呼唤风雷，渴望革新力量的崛起，并将希望寄托在“山中”世界。他相信“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可悲的是，清醒者的呐喊被暗夜里的鼾声淹没，抑郁不得志的龚氏不得不道出最后的忧思：“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③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龚自珍言中。

一

面对突如其来的殖民战争，自大、麻木的政治集团束手无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和无奈，但其灵魂仍然沉浸在天朝威仪的亢奋中。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统治者心态依然陷于“夏”“夷”的臆想构架，整个民族仍然缺乏深刻的反省和检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因此，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最初见面和碰撞，只能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它无法给病人膏肓的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的震撼和警醒。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

① 王俊义、曲弘梅编：《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第70页，巴蜀书社，1997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③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页。

国尽管已开始了被迫的门户开放和学习，但是，无论是洋务派还是保守派，对西方文明的整体认识都还十分模糊，“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①的思想在维新变法前占主导地位就是一个明证。

此间除了器物层面的学习、引进任何对传统文化、体制的怀疑和反思，都会受到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压制和警告，甚至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悲剧具有典型意义。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熟悉洋务的福建按察使、翰林郭嵩焘为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出使大臣，顿时谤声四起，舆论纷纷指责郭嵩焘为士大夫蒙耻。一首讽骂的联语这样写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在上下左右的指斥声中，郭嵩焘于翌年赴英，但厄运并未停止。作为驻英使臣的郭嵩焘携其夫人宴请外宾，这本是正当的社交礼仪，但舆论哗然，“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③。郭嵩焘的旅途见闻《使西纪程》按朝廷惯例寄回国内，文内记述了对外国政教见闻的观察，并指出了办理洋务的得失，意在为国内官员提供参考，但却遭到士大夫的群起攻讦。最后他不仅未得朝廷重用，而且受尽了保守派的攻击、嘲弄，于1891年

① 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中国书店，1990年版。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三日，转引自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39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③ 《申报》1878年11月15日。

抑郁而死。此番出使，郭嵩焘不仅受皇命差遣，而且由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多次召见，可谓恩宠有加。然而，在士大夫阶层的群起打击、排挤面前，连当初派遣他的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保全他，由此可见士大夫阶层保守思潮的势力之大、之强。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夏夷”观念和无知，将一位热心洋务的外交官逼上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祭坛。1881年，首批中国留美学生因长期受异域社会平等、自由思想和生活习俗的影响，遂有剪辫、穿西装、去教堂之举，士大夫闻风，批评、攻击他们“数典忘祖”、“丧失德性”^①，朝廷遂下令撤回留美幼童，使近代第一次官派留学中途夭折。上面的例证，只是戊戌变法前保守与革新势力相互抗争的一个侧面。由此可见，真正向西方的学习在当时十分艰难，充满禁区。朝廷上下，把持主流话语圈的当政者和士大夫阶层只是想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兵工、制造之术，他们在心底里认输的只是“技”不如“夷”人。所以，提倡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人士，如覆薄冰地琢磨着怎样曲折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思想的萌芽处于非法状态。

搭乘商船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了他们全球化的宗教传布和文化传播。他们曾雄心勃勃地开列过一份影响中国士大夫的计划书，然而在1890年以前，这种影响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倒是没有功名的下层人士在学习西方时表现得直率而又坦荡，这包括对西方器物的应用、谋生技能的掌握、医疗和教育的接受等。正如阿诺尔德·汤因比说的，“在接受世俗化

^①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第541页。

的近代西方文化方面”，中国和日本“都是自下而上地发轫的”^①。然而，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最终发生大范围、深层次的交流、对话还得通过士大夫阶层，因为他们掌握、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只有变革的力量最终影响了他们并产生某种作用，文化的传播才算真正实现了其最初的目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伴随着 19 世纪中后期政治集团提倡“洋务”这一显性学习，域外文化的隐性传播在民间如一股暗流在涌动，这就是现代传播系统的中国化、现代传播媒介——报刊、出版、学校的扎根和萌芽。尽管早期的域外文化传播仍只限于器物层面的学习、借鉴，但随着全球化殖民统治强行登陆的外报和教会学校，不但为国人办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人才资源，而且培育了广泛的读者群。同时，教会学校的迅猛发展，刺激了中国民间和官方的办学，从而出现了中国士绅与传教士争夺教育阵地的办学竞赛。这一切都孕育着对域外文化的全面学习和反思即将展开。1894 年的甲午海战失败，举国震怒，引爆了中国思想界的火山。耻辱情绪加速了反思的进度，强国保种的民族救亡压倒了一切。于是，学校和报刊的大力创办，作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被趋新士大夫提上议事日程。禁区终于由维新变法人士撕开，挟裹着西方文化的新学说和新思想通过新兴的现代传媒大量涌入，有力地配合着由皇帝和趋新士大夫发动的变法运动。戊戌以降，终于迎来了一个国人办报和办学的时代，文化传播输入了新的学理、思

① [英] 阿诺尔德·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下册，第 21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想，同时也带动了传媒本身的发展。它们像两只车轮，艰难地碾压出了一条思想解放之路。不但形成了参与社会、文化变革的“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而且影响了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使日益壮大的新知识群体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从此，“救国的思考点从客体转向主体，从注视外在的物化形式转向透视内在的国人心灵”，实现了“思维方式的一大突破”^①。从被迫打开国门到实业救国、维新救国的失败，趋新人士终于从鲜血的教训中走出，掀开了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的新篇章。

二

之所以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及新文学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在“前全球化”的驱使下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现代传媒不但是文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而且，它引进了一整套新的价值系统，它的现代理念、生产方式、公共性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所以，从文化传播史入手可以更真实地触摸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此，曹聚仁有着明确的认识，“中国的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

^① 梁景和：《清末国民意识与参政意识研究》，第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业发展史'^①。陈平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现代文学史家王瑶很早就注意到了报刊研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认为“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 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②，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③。我以为，这一看法确实一语中的。王瑶不仅注意到了刊载形式的不同对文学的影响，而且，也看到了文学生产、传播、买卖的文学生态系统和流通过程对文学的影响。现代传媒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参与是全方位的，它直接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思维形式，将文学纳入一个公众参与消费的空间，只有回到这一特定的氛围中，作家真实的精神状态和作品的价值才会在文学史家那里得到真实的显现。同样的话题，在新闻史研究专家方汉奇那里也得到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不仅中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报纸与读者见面的，而且，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也是通过报刊这个阵地滋生、发展起来的^④。在实际研究中，阿英、张静庐两位很早就致力于晚清报刊与现代文学史料的辑录和整理。学人中郭延礼、吴小美、陈平原、袁进、王中忱、杨义、陈万雄、杨扬、刘纳、孙晶、栾梅键、鲁湘元等人先后从不同的视角切入传播媒介和近现代文学的研究。或从宏观入手，探讨新式媒介的兴起与文学的生产、传播、发展 或从文学报刊史的角度编写“新文学图志”或致力于文学报刊、社团、出版机构与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或

①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第 8 页、第 83 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 年 1 月 9 日。

③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763 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从市场经济和稿酬制的视角探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总之，他们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一学说的引入，使进入 21 世纪的文化传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特点，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出现了一批博士论文，从“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变，使这一研究具有了多元性。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有更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自 1815 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问世到以《新青年》、《新潮》等传媒为主体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清末民初的文化传播历史长达 100 年，但是，传媒真正对文学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却始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降，其重要标志是“公共舆论”和“公共空间”的形成直接影响了文学的流变、生产和传播。在此间，文艺杂志、报纸副刊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有了专门的文学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文学的大规模生产因为新式印刷技术及现代传媒的支持成为可能；现代教育体制的引入，不仅从旧的体制内解放了知识分子，使之参与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而且培养了大批的文学作者和受众。自梁启超 1902 年创办《新小说》掀起‘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现代中国文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由“公共舆论”参与并导引的。所以，本书的展开主要围绕文化传播媒介的兴起、转型，以及文化制导系统的变革所带来的中外文化的碰撞、对话，来探索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对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影响，从而更为准确地考察新文学发生的要素和渊源。

首先，传媒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书写、生产方式，而且

也使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革，即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诸方面均发生了质的变革。这就是文本创作者身份的普及化，生产复制的机器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接受者的大众化。现代传媒使文学由封建士大夫特权阶层的专利品，变成了普通民众参与共享的精神资源，解放了文学，加速了文学艺术的平民化过程。这既适应了开启民智的思想启蒙运动，又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可能。

其次，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潮、新风格，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①的实验和冲动。小说、戏曲原为文学的末流，长期以来被放逐到文坛正统之外，随着开启民智的“新民”需要被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的地位，实现了艰难的蜕变和转型。诗的神性规则被打破，从“诗界革命”的通俗化、自由化到白话诗，不但诗体走向解放，而且实现了“新意境”、“新语句”^②的体认与个性化的追求。散文走出“古文”的阴影，打破了一切樊篱，直接与社会变革相结合，从而孕育了充满“魔力”的“新文体”。总之，“每一种文学体裁之改革都以‘新民’和‘使民开化’为最急切的目标，它们一致要将人民‘从睡梦中唤醒起来’，都以改造国

① 吴组缃、季镇淮、陈则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民的文化心理素质为己任”^①。

第三，无论是文学市场化、大众化，还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新变，都预示着传统文学的话语形式已再也无法“旧瓶装新酒了”，所以，文化传播符号——语言文字的变革十分紧迫。这就是由传媒直接导引、参与的两次白话文运动和自清末开始的汉语拼音实践。目的就是要让汉字简单、易学，成为一种开启民智的工具、文化传播的工具，实现“言文合一”。“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②这一理想终于由新文学完成。

所以，我认为，新文学的发生，不是20世纪初叶一帮留学生振臂一呼于一朝一夕间发动起来的，它是“前全球化”下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相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伴随着对域外文明的强烈渴求。它在客观上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文人—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是域外文明的进入与绵延不断的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晶。清末十字军东征带来的“剑”与“火”，在刺伤国民自尊的同时点燃了域外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的导火索。士大夫们从拒斥、犹豫中开始反思，文化的“开启民智”、“文学救国”的烽烟四起。之后的辛亥革命中，一股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几乎与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同时成长，势如破竹。这一切都使得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和碰撞，从而激活、重构、刷新着传统文化，引入了令民族震惊和自省的世界文化的参照坐标。中国文化的制导系统在此间发生了创造性转化，催生了新文学，

① 范伯群、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卷，第2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胡适：《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

并不断支配、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学变革的流向。这就是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发生的基本形态。

三

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对将要展开的研究对象——“文化传播”这一概念，给予定位和限制，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传播主体——文化“把关人”^①：报刊、出版机构的编辑，翻译家以及新式学校的教育者，文学创作者等。

传播载体——媒介 报刊、出版社、学校等。

传播内容——信息：传媒所传播的文化、文学思潮和新式教育的内容等，同时还有媒介本身，因为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②。

传播对象——受众，他们是文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的承受者和体认对象，也是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因为文化的延续、传播将由他们继续下去；换句话说，受传者同时也是传播者。

①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第 161～162 页，新华出版社，1984 年版。威尔伯·施拉姆的新闻工具的“把关人”论认为：“大众媒介是社会上的信息流通过程中的主要把关人中的一部分。在信息网络中到处设有把关人。”主要包括：记者、编辑、教员、作家等。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 1947 年所写的《群体的生活渠道》中提出“把关人”又可称为“守门人”。

②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第 33～34 页，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媒介即是讯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媒介具有塑造和控制的作用。

传播效果——文化传播的内容对受众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根据美国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的“五W”模式，这里的文化传播过程可以这样表示：传播者—讯息—媒介—接受者—效果。简单地说，这一过程也就是指：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谁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当然，文化的传播决非完全按照这一线性结构进行。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威尔伯·施拉姆的传播循环模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就是从编码（输译者）—信息—译码（解译者）编码—信息—译码（输译者）编码是一个环形的、往复循环的过程。这使得我在研究过程中对信息反馈在传播中的重要性有了足够的认识和注意。

清末民初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兴起，是“前全球化”这一趋势的产物，但它提供了中外文化全面碰撞、对话的可能。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异质文化是如何在对话、碰撞中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新文学。现代传媒的萌芽、成长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传媒和文化“把关人”在整个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文化人士的互动对文化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如何辐射到文学变革？所以，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的发展史探索其对新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文学的发生中寻找它的历史渊源。

当然，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文化传播过程的某些环节有时是交织、渗透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影响对文化传播整体思潮的把握和观察。在复杂的文化传播现象和现代传播系统的发

展中 那些有代表性的传播媒介、文化“把关人”、文化思潮、受众群体将得到关注，其余的都将成为背景资源给予透视。目的是想通过点与面、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从文化传播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新文学的发生。所以，这不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史论，只是新文学发生史的一个侧影研究。不完美之处自然存在，祈望读者匡正。

第一章

现代传媒的登场和参与

近代社会变革中的中华民族，背着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经历了从被迫到自觉的灵魂蜕变过程。早期现代传媒的萌芽尽管是西方殖民文化扩张的产物，但是，随着文化传播的深化，它的登场和参与日渐成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不仅作为域外文明与传统本位文化碰撞、对话的媒介存在，而且成为走向现代化的象征，因为它在重新架构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传媒的公开性、传播的迅速及时、辐射的广泛度，都与传统媒介迥然不同。所以，阅读现代报刊、新式出版物成为接受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这对于有着强烈入世意识的士大夫文人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时曾对此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士大夫对于现代传媒的认识，实际上更看重的是传播的工具化特质。于是，传媒的公共性和干预、批判、向导的功能，日益影响着他们的观念并辐射向大众，他们越来越依赖传媒力量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因为这是发表

言论、参与政治的最佳舞台。

关于设立报馆的呼声自王韬创立《循环日报》起日益强烈，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馆“耳目喉舌之用”^①的观点就是从这里来的。梁还注意到了报刊传播对于民族强盛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他的文化传播观念。他认为：“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报馆越多，国家越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上下蔽塞，左右蔽塞，“喉舌不通”，“病及心腹”^②。之后，围绕推广学校、设立书局和报馆的议论不绝如缕，其目的都是以此作为开启民智、图强保国的民族救亡手段。正是开明官员和趋新士大夫文人的竭力倡导，现代传媒终于在19世纪末随着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而全面登场。新的价值观、文化习俗，以及政治、科技、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域外文明由此进入中国社会而与传统文明发生碰撞，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论国民采用了怎样的接受方式，域外文明的传入改变着中国社会，这一点确凿无疑。随着传媒力量的日益凸现，逐渐形成了一个舆论空间，这就是“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新思潮借此喷涌，社会变革因此而变得异常剧烈、活跃，因为社会变革的“能动性的倍增器”^③和加速器——“公共舆论”正在发挥它的作

①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8月。

②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1896年8月。

③ D·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说：“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灌输一种现代或是能动的人格。第二要素是能动性的倍增器，即大众传播媒介。”转引自[美]韦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第46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用，不断改变着民众的文化心理。

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来说，它的发展、演变与此间传媒的息息相关的命运尤为突出。因此，为了论述文化传播与文学的联系，首先得廓清“前全球化”下现代传播媒介这一文化制导系统在近代的演变、发展轨迹。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剑”与“火”

中国曾产生过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但现代意义上的报业萌芽却是近代的事，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扩张的直接产物。

研究者认为，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诗人王建曾作《赠华州郑大夫诗》，其中两句“报状拆开知足雨，赦书宣过喜无囚”中的“报状”就是朝廷发行的官报，主要用于朝廷的事务发布，这是有关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记载。唐人孙樵在其所著的《经纬集》卷三有《读开元杂报》一文，对唐代存在的类似于报纸的传播工具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他所记载的“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数十幅书”用来发布朝廷政事动态、官员迁谪，带有政府公报性质。除此之外，在唐代还有一种“藩镇情报”，称之为“邸报”、“邸吏状”、“进奏院状报”。戈公振指出：“‘邸报’二字之见于集部者，自唐始”^①，并引用了宋人的《全唐诗话》第三卷的一则事实：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3页，三联书店，1955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